

風

雨

中

的

離

係

李輝 著

为了一个不应忘却的年代
为了永远从历史恶梦中醒来
谨以此书献给在那个年代中受难的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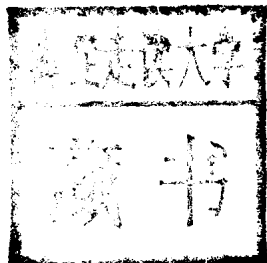


K825.6
LH/1

李辉
著

风雨中的 雕像

山东人民出版社



042172

内容简介

本书以凝重的笔触,记述了 11 位富有代表性的文化名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如邓拓、吴晗、田汉、老舍、胡风、冯雪峰、赵树理、萧乾等,并通过他们的遭遇,发出深刻、深长的感叹,其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和别具只眼的议论,读来动人心魄,发人深醒。

书 名 风雨中的雕像

著 者 李 辉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地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版 次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7 年 10 月第 3 次印刷

规 格 32 开(850×1168 毫米)

10.375 印张 228 千字

印 数 16001—36000

I S B N 7-80603-111-1/Z·6

定 价 21.5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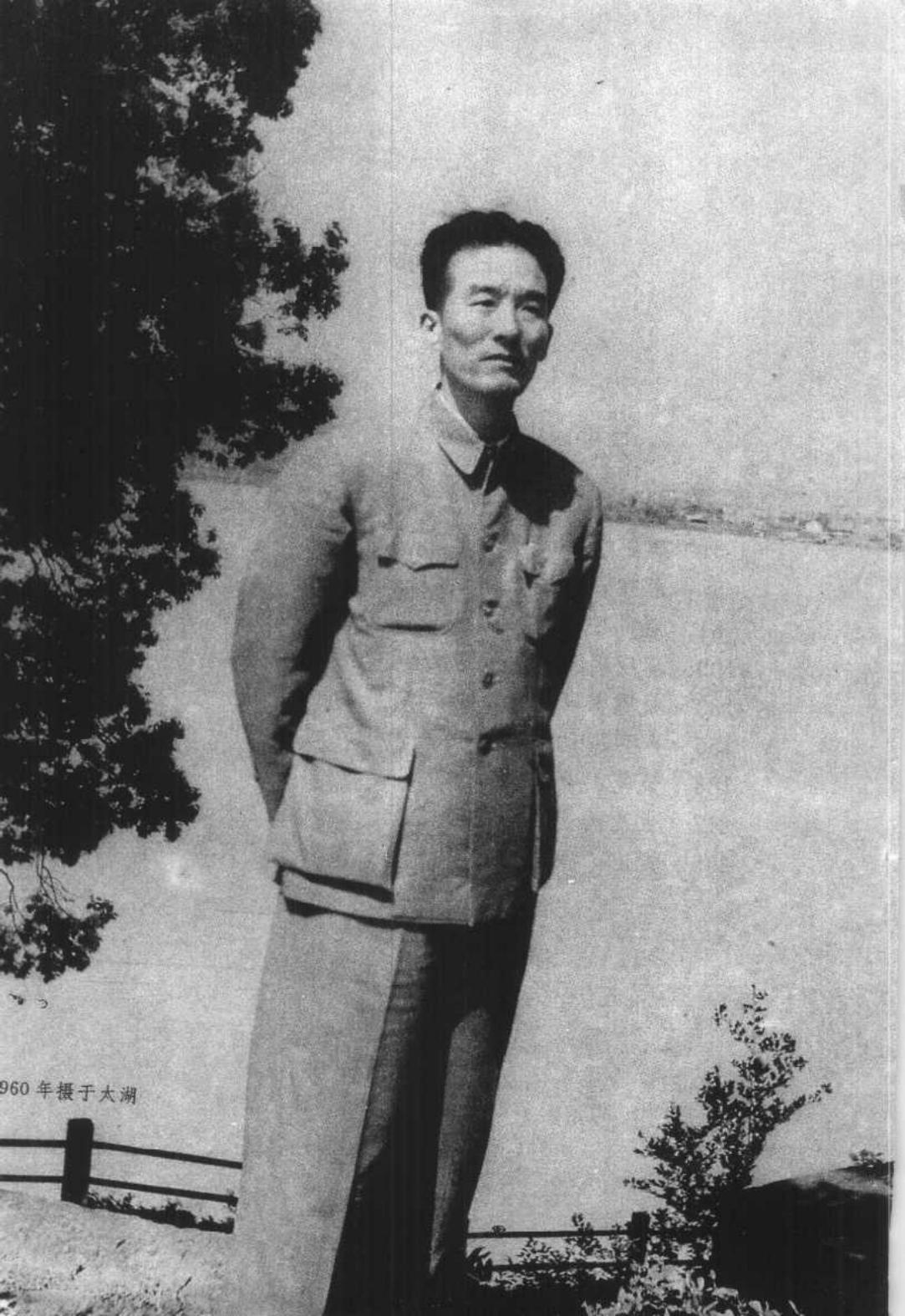
34105216

为了一个不应忘却的年代
为了永远从历史的恶梦中醒来
——谨以此书献给在那个年代中受难的人们

作者题记

目 录

- 3 书生累——关于邓拓的随感
- 31 碑石——关于吴晗的随感
- 57 落叶——关于田汉的随感
- 81 消失了的太平湖——关于老舍的随感
- 109 清明时节——关于赵树理的随感
- 133 凝望雪峰——关于冯雪峰的随感
- 155 风雨中的雕像——关于胡风的随感
- 183 萧乾：劫乱前后
- 217 生死两茫茫——黄苗子、郁风在“文革”中
- 265 走出“叛徒”迷雾——刘尊棋在“文革”中



1960年摄于太湖

书 生 累

——关于邓拓的随感

邓拓为丁一岚写过一方诗绢，抄录着他在1944年秋天写给她的一首长诗《战地歌四拍》。诗是作者气质、情感的浓缩，一方诗绢的经历，更是历史的浓缩。

“文革”风暴骤起，邓拓含冤自尽，丁一岚眼见得抄家之风一时间漫卷京城，为了保存这方诗绢，她小心翼翼地把它缝在棉衣内襟里。她忍受着痛苦，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珍藏起自己的思念，珍藏起邓拓给予她的全部情感。十年悠悠，十年艰难，终于等到了使它重见天日的那一天。当她有机会重新抚摸这方诗绢时，她觉得对邓拓的理解更深，因而思念也就更深。

在知道了这个故事之后，我便一直希望有机会能亲眼看看这方诗绢。

我走进了丁一岚的书房。她拿出了诗绢。为了便于保存，诗绢已经装裱。我们小心翼翼地在书桌上将诗绢慢慢铺开。慢慢地，慢慢地。对于她，仿佛是不愿惊动一个安宁的灵魂；对于我，则是不愿意妨碍她那重又开始流动的记忆。

浅黄色诗绢出现在眼前。为了装裱，诗绢原来的花边被裁去，但不损原貌，邓拓墨迹苍劲有力，依然清晰。在我看来，这该是

丁一岚最珍贵的念物。她轻轻抚摸，又轻声吟诵几句。从她的目光中，我分明感觉到历史烟云在飘动。

顺着她的手指，我浏览着诗绢。突然，我发现其中的第二拍，比我从《邓拓诗集》中所读到的要长。我诧异地问。原来，在收录入集时，第二拍做了压缩。我仔细阅读，发现被压缩掉的诗句，都写得惆怅委婉，因惆怅委婉而更显其优美感人。

《战地歌四拍》的第二拍全文如下，括号内的诗句为诗集中未收录部分：

青丝依样似旧时，〔镇日书空，孤怀无寄！入乡有意
从头认，壮志纵成烟，不向蓬蒿浪掷！〕心血如潮，七度
春秋销北地，数三十又三年，〔衰逝堪伤天欲晦；〕问后
来岁月，还能几许？〔古道凄清埋诗冢，高山流水休再听，
广陵散绝，无复当年韵！〕只如今抖擞旧精神，酬尽心头
文字债，待取新衣上征途，好将身手试，长为孺子牛。

我不理解为何要做这种技术处理，诗句删节后，毕竟无法体现原作神韵。丁一岚告诉我，在编选诗集时，她考虑到这首诗写于抗日战争中，本应充满昂扬和豪迈，而邓拓那些惆怅情绪，需要做特别的注释读者才能明白。为此，她才决定暂时删除。

邓拓的这首诗写于1944年秋天。从这一年夏天到第二年的春天，对于他们夫妇来说，是艰难的一段时光。他们一起进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学习，参加整风。他们不在一个队，分隔两地，突然而来的“抢救运动”，把邓拓纳入到被怀疑的范围。丁一岚回忆，康生当时在延安说河南的党组织是“假党”，在河南工作过的同志都要受审查。邓拓在河南工作过，而且还被捕过两次，自然成为审查对象。幸好后来“抢救运动”紧急中止，邓拓方避免了进一步的厄运。



1950 年与丁一岚在北京北海公园

给丁一岚写诗的时候，邓拓无法得知自己会遭遇到什么样的结局。他有满怀的热情和忠诚，有不断高涨的斗志，他毫不畏惧战争的艰苦，毫不屈服敌人的淫威，但对来自自己阵营的怀疑、打击，他却难以承受。满腹心事，惟有对亲人倾诉！关山阻隔，处境微妙，命运难测，一个像他这种气质这种修养的人，诗是他最好的寄托。他不可能抱怨组织，更不会因自己遇到挫折而失去斗志。但是，“文人习气未能无”的他，却愿意用惆怅来写诗，用隐晦的方式，向亲人流露出内心的思绪。

因这诗，一个立体的丰富的邓拓才呈现在历史烟云中。

惆怅和忧郁，并不总是灰暗与消极，也不会是豪迈、昂扬的对立面。它们不会损伤人的理想主义，不会让人消沉。相反，在特殊情形下，在特别的人身上，它们反倒使豪迈和昂扬更为深沉。

邓拓正是如此。他为前途难卜而担忧，为满怀壮志有可能化

为云烟而流露出伤感。但是，他依然痴心不改，坚贞不渝，依然吟唱着“壮志纵成烟，不向蓬蒿浪掷”的豪情。

这便是邓拓。

我看重邓拓在《战地歌四拍》中体现出来的这种矛盾心情。实际上，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仍将不断地相遇类似的境况，他总是承受着精神矛盾，为他所追求所忠诚的理想和事业忘我工作。在抄写诗绢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一生中还将重复诗中的这种体验，不断地走在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但生命最终竟会在那样一种情形下以那样一种方式结束，则更是他无从想到的。

我倾听着《战地歌》的旋律。那方淡黄色诗绢，总是飘在我的思绪里。

把邓拓做一个概说其实并不容易。

人们有充分理由将他看作一个才华横溢的文人——他自己时常的说法是“书生”。他擅长书画，对历史文物研究有精深造诣；他喜爱诗词，兴之所至，情之所系，时有绝唱；他独创“燕山夜话”杂文文体，厚积薄发，言简意赅，一时间风行全国，洛阳纸贵。有时，他显得飘逸，在与文人墨客的唱和中俨然其中一分子；有时，他又显得凝重，在文思泉涌中，履行着一个文人忧国忧民的天职。仅仅这些，就足以使他在现代文人行列中，占据一个醒目的位置。

然而，这绝非邓拓毕生追求的目标，更不是他所希望的。

最初，当听说我准备用《书生累》作为这篇文章的题目时，丁一岚就表示过不同想法。她说，邓拓并不是一个书生，更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那种“书生”。他是一个革命斗士，是一个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并有可能大有作为的人。“书生”的范畴，无论如何也难以完整体现邓拓人生的全部内涵。

当时我说，我并不是将邓拓看作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书生，更

不是那种文弱书生，或者说仅仅沉溺于文化创造的书生。他是以书生气质投身于革命的一个类型，一个范本。书生气质自然不是他的全部，但恰恰因为他带有书生气质，他才能够与众不同地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出他独特的东西，才会产生那么丰富的内心世界，从而才会有他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文化创造。

我不知道我是否说服了她，她最终是否接受了我的说法。现在想来，这对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天我突然感觉到，我们这一代人和他们那一代人，在许多问题上，看法可能永远难以一致。

我们没有他们相似的经历，也就没有了置身于历史之中的切身感受。我们只能是旁观者，站立在岸边观看历史风景，可以让心情常常处在平静状态，让目光尽可能地冷静。我们是根据业已发生的历史来做出判断，种种历史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细枝末节，却有可能被忽略不计。某种程度上说，置身于外的人，或许永远也走不进历史深处。

他们却不。当他们投身于历史进程之日起，就注定随着历史的惯性向前走去。他们看重每一时刻对心理对情感的影响，珍爱所有难以忘怀的一切。时光的每一次流逝，漩涡的每一次旋转，大潮的每一次腾跃与跌落，对于他们都有特殊的意义，而这不是所有人都能经历都能感受得到的。于是，他们不会做到绝对的冷静，而旁观的态度，更是他们无法忍受无法接受的。既然他们已经献身于所追求的事业，就再也不会愿意让自己身上的这种色彩淡去，哪怕发生任何事情，都不会例外。

在产生了这样一些想法之后，我觉得自己仿佛更加理解了那一代人。

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当我第一次去见丁一岚准备谈论邓拓时，她却用了更多的时间同我谈论周扬。和一些老前辈一样，她不能同意我用“仕途”这一世俗的观点来看待周扬，因为，他们

都曾用全部热情拥抱着革命，而那时，吸引他们的不是权力，不是仕途。她还不能同意用“摇荡的秋千”来比喻周扬 1949 年后在权力和文化创造上的摇摆。因为，对于他们这代人，革命永远是第一位的，对领袖的无比忠诚，也是历史形成的，是无法改变也不可能改变的。

说实话，我很喜欢这样的交谈。两代人的不同视角，有时需要彼此转换，也许这样，沧桑云烟才会看得更为清晰。

与其说丁一岚在说周扬，不如说她是在说邓拓。

邓拓并不像曾被指责的那样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他也不是不懂政治的文人，相反，自投身于革命的那天起，他就与政治息息相关，在同时代的革命者中，他称得上一个具有很高理论修养和政治敏感的人。



1934 年摄于上海

青年邓拓喜爱写诗，但仅仅是兴之所至的偶然吟唱，他的兴趣在历史、哲学，而这才是政治斗争中最为重要的东西。他研究历史，以一部《中国救荒史》来显示年轻的他，有如此冷静的心境和目光；他研究哲学，以最新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批驳他所认为错误的论点，从而显示出他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这一切，不过是他在晋察冀根据地成为思想宣传领域一位重要人物之前的训练和铺垫。

他以年轻而成熟的姿态出现在战火烽烟之中。读那些战友的回忆，不难看出，在当时的

环境中，长期担任《晋察冀日报》社长的邓拓是如何出类拔萃，又是如何举足轻重的。他所表现出来的，绝不仅是一个文人的才能，而是一个政治家的才能和魄力。

邓拓崇拜毛泽东。与一般人不同，他的理论修养和政治素质，使他不仅仅出自一种朴素的感情，而是基于理论钦佩之上的由衷爱戴。他被认为是最早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家之一。他在1942年撰写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系统论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论著之一，而由他主编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更是第一部毛泽东的选集。当他在极其艰难的战争条件下进行这些开创性的政治活动时，他已经在履行着“政治家办报”的职责。他非常清楚，今生今世的所有创造和所有价值，再也不可能与政治脱离。政治热情不会淡去，发自内心的对毛泽东的崇拜，也不会淡去，他的生命将永远与革命相伴。

这便是邓拓的政治家本色。如果永远处在战争状态，如果永远没有种种意想不到的波折，我相信他将一直沿着这样的脉络发展下去。

当计划写邓拓时，我发现自己这些年的工作经历，无意之中竟然与邓拓产生了某种重要联系。

大学毕业后我到了《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这是与邓拓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副刊，当年他正是应副刊编辑的约请，为“五色土”开设《燕山夜话》专栏。我走进晚报时，约请邓拓开设专栏的两位编辑仍然活跃于报社，而我的编辑同事中，还有邓拓的儿子。和这样一些与邓拓有着密切联系的人一起共事，坐在曾经留下邓拓足迹的大楼里，就有了一种与历史对话的特殊感觉。现在想起来，这个经历对于自己是十分重要的。记得偶尔谈起《燕山夜话》，偶尔谈起“文革”中副刊编辑受到株连的惨状，大家便有了止不住的话题。他们零星的回忆，使我对陌生历史的了解，一



抗战中在阜平（1943年）

日日多了起来。

后来我到了《人民日报》，这更是与邓拓政治生涯紧密相关的地方。从1949年开始担任总编辑，到1958年因不断受到不公正的批评与嘲讽而“辞职”离去，邓拓在这里工作了将近10年。从时间上看，这与他战争年代的10年新闻生涯是一种自然延续，但给予他的感受却有所不同。他的忠诚、他的热情、他的认真乃至才华，在错综复杂变化异常的政治风云面前经受着考验和磨砺。

一次我参与报史的资料整理和梳理工作，重点是介绍《人民日报》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的关系，这就有机会查阅一些当年的原稿和清样。我看到，那些决定着胡风命运的材料、文章，都是由邓拓最后签发付印的。看他校改的清样，看他匆匆写下的同意付印的批示，我当然无法了解他挥笔时心中真实的想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这样的事情上，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

位，他绝对不会将个人的想法或者情绪体现在报纸上，丝毫也不会。人们记忆中的邓拓，是全身心扑在工作上，忠诚地坚持着党性原则。我完全相信这一点。

然而，他的被误解、被指责甚至被嘲讽，恰恰因忠诚而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因为在反右运动前后不能充分理解“阳谋”而开始受到批评和冷落。作为一个长期主持党的报纸工作的人，作为一个有高度党性原则和革命信仰的人，他不能赞同各种形式的对党的批评，尤其不能同意在党的自己的报纸上发表那些言辞激烈的批评。他的思路一直顺着历史脉络走着。他的才华和学识，他的性格，还不能使他灵活地理解“引蛇出洞”的真实含义。于是，在1957年的1月，当别的报纸开始“鸣放”时，《人民日报》却与众不同地发表不赞同鸣放的文章，同时他还阻止了报社一些人的鸣放。后来，他默默地承受了“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的批评，可更多的人却因为他而避免了成为“右派”的厄运，并为此而深深感激他。

我现在无法断定的是，他最初的谨慎，到底是出于正统的惯性，还是对政治斗争未来走向的预感？

他的政治家办报的素质和原则并没有改变，他对领袖的忠诚也没有改变，是他之外的东西发生了改变。政治操作过程不再同于从前，现实生活的形态也不再容易把握，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明白，在他这里，以往的种种对政治的理解，以往对原则的确定，居然一下子失去了效能。他的政治修养和素质，他的性格，还不足以使他成为一个被动地旋转的风标，或者索性变为一个浅薄的、毫无政治操守的政客。

他怀着难以言喻的心情离开《人民日报》，他为自己的被误解而苦闷不已。

我猜想，对于他这样一个具有文人情怀的革命者来说，他有可能会对自己所亲身经历甚至亲自参与的种种文化批判产生复杂

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风
 非梦亦如烟。文章病
 纸书生果，风雨同舟战
 友贤。屈指知功与过，
 关心数量反争先。平
 生赢得自由多，东望
 国子南楼接天。
 柳拓 九二
 九二

的感受。《武训传》批判也好，《红楼梦》研究批判也好，“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也好，一个接一个令人眼花缭乱心绪不宁的批判，难道在他将清样签发付印之后，就完全化为云烟飘荡到他的思绪之外？显然不会。他会思考，他会咀嚼种种感受。当然，他不会游离于党性之外，但各式各样人生的、情感的、心理的影响，会深深地存在于他身上。

邓拓会感受到精神之累。

1959年书《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诗

在《人民日报》开始

鸣放之后，邓拓曾以“卜

无忌”的笔名发表过一篇《废弃“庸人政治”》的杂文，文章批评凭着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政治活动，认为这在实质上都可以说是“庸人政治”。他的这种批评的重要性和尖锐性姑且不论，从字里行间，我感受到的却是他在工作过程中体会到的苦恼。表面上看似乎是宽泛地议论，但实际上他已经把自己放了进去：

陆放翁在一首诗里写道：“庸医司性命，俗子议文章。”这是切中要害的警句。想想看，病人碰到了庸医，乱开药方，乱治一阵，小病变成大病，大病则呜呼哀哉，

这条性命不是丧在庸医之手吗？一篇好文章落在俗子手里，他自以为无所不通，吹毛求疵，滥加斧削，岂不可惜？但是，当着庸医负责治你的病的时候，你的性命就掌握在他的手里；当着俗子做了编辑的时候，你的文章也不得不由他随便议论和取舍了。

我自己也患过病，也当过编辑，各种感受都有一些，说几句由衷之言，并非危言耸听。

当更深的误解落在他身上之后，他的这种精神之累将使他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作为一个革命的“书生”所应尽到的历史责任。他离开了报社，却走进了他生命中一个新的境界。

在《人民日报》为他举行的送别会议上，邓拓吟诵了那首著名的《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袁鹰清晰记得当年大家聚会欢送邓拓的场景。当时他在《人民日报》文艺部，长期在邓拓的领导下负责文艺方面的工作。他和同事们静静地坐在台下，心绪万千，凝望着曾经朝夕相处的值得敬重的邓拓。

邓拓在讲话结束时，念了上面这首七律。他一句一句地念着，有的略加解释。念到“文章满纸书生累”时，他特地提到前几天还有位老同志说他“书生习气未能无”，语气之间，有点自责，也有点自信。袁鹰的记忆里，邓拓当时的神态安详，感情真切，一如10年来他多次在那讲台上做报告时一样，只是声调中略带着一丝怅惘的情味。袁鹰反复吟咏、咀嚼这首告别诗，感到这不是一般的应酬之作，而是如同古人评诗所说：深情绵邈，寄托遥深。

《人民日报》的办公楼当时是在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上。若纯粹从商业眼光看，在商肆云集的这条著名大街上，一座这样的楼可